

利 益 结 构 论

陈 祖 华

本文试图以社会历史领域广泛存在的人的利益行为为切口,吸取行为科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系统科学以及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价值哲学等多学科的优秀成果,密切联系我国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实际,初步解剖并阐述社会历史,特别是商品经济发展时期社会发展的动力学机制,探讨利益的生成与发展规律,利益结构及其演化,利益结构与社会震荡,利益结构的不断调整与社会进步等问题。显而易见,这种探讨无论对于适当转换社会发展动力问题的研究视角,突破历史唯物论原有的理论框架,还是对于不断调整我国当前的利益格局,推动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进一步发展,都会具有重要意义。限于篇幅,本文只能就上述问题作一个概括的论述。

一、利益的驱动功能与社会动力学

历史唯物论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这条基本原理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它是对诸种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一种抽象,带有非个性化、理性主义的特征。历史唯物论本来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变化的,但我们在那里却较少看到活生生的个人,人的个体不时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非个性化的一般社会关系所淹没。历史唯物论原有的理论框架确乎带有理性主义、结构主义的色采。现在情况不同了,特别是在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面临全球性的生态、能源危机的情况下,人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尖锐地突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适当超出理性主义的范围,对社会发展作一些实证性的研究,使历史发展的抽象理论回到人类社会的可感觉的世界之中,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是历史唯物论的一条重要原理。这条原理从一般社会关系转向了人。但是,这里的人民群众仍常常具有某种抽象化、一般化的性质,而且主要是从生产与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角度来加以论述的。不能否认,生产活动具有现实的、可感觉的特性。然而,人为什么要进行生产呢?人难道不是为了满足一定的利益需要而生产吗?人的浮现于社会表层的各种行为,实质上不大都是一种利益行为吗?

与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原理相比较,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原理更为具体一些了,它从一般社会来到了阶级社会,从非个性化的一般社会关系,回到了有阶级存在的人的世界,揭示了有阶级存在的人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系列重要关系,揭示了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学机制。然而在阶级基本上被消灭以后,它在社会生活领域所起作用的范围就同此以前大不相同了。

鉴于上述原因,作者把眼光集注于社会历史、尤其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时期人的利益行

为,并以这种具有可感觉特性的、向个性化逼近的、主体性与客观性统一的利益行为为基础,进而论述利益行为、利益、利益结构及其演化对于社会历史发展的驱动功能,阐明其对于现代化建设与改革发展的推动作用。这样做,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试图突破原有的社会动力学原理,建构一种可供选择的、以利益行为、利益发展、利益结构及其演化为基本理论范式的社会动力学理论框架。当然,作者也充分意识到现在仅仅是一个开始,离实现这一目标还很遥远。

二、利益的生成机制与发展规律

人的双重属性即社会性与动物性,决定了人的利益需要。人既有生理的需要,又有安全、社会、自我、自我实现的需要。^①它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也是一个逻辑与历史基本一致的结构。

利益需要对于价值观念来说,具有本原的意义。价值观念是人对利益需要的一种自我意识。换一个角度说,价值是世界对于人的意义、作为客体的个人对于作为主体的个人的意义,价值观念则是关于这种意义的观念。无论从历史的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人们的价值观念都是五光十色的,价值观念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当然这个价值观念的多元世界,并非是互不相干的非系统元素,它们之间的相干作用不是零,而是一种或大或小的正负数。由此可见,否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是不对的,否认这多元世界的相干性、系统性也是不对的。

利益需要与价值观念的结合,在人们的行动中就表现为利益行为。利益行为与社会基本矛盾相比较,是一种经验性的、人格化的或接近于人格化的存在,具有强烈的、易于感受的动态性特征。利益行为直接影响人们的利益所得,在现实性上推动着利益的发展与利益结构的变化。它可以具有阶级的属性,也可以不具有阶级的属性。因此,以人的利益行为研究的起点,兼有实证性、普适性与可深入性等多方面的优势,对于实现本文所企求达到的理论目标与实践目标是十分重要的。

利益行为所产生的直接成果,就是利益所得。它可以是正值,也可以是负值,其绝对值可能大,也可能小。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利益所得是利益行为的对象化。它对利益行为(包括利益需要与价值观念)的强有力的反馈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利益需要、价值观念、利益行为与利益所得的整合,构成本文所阐述的“利益”范畴。因此,“利益”是以人的可感觉的利益行为为基础,以一定的价值观念为导向,以满足人的一定的利益需要为目的,并通过一定的利益所得加以体现的现实成果。利益由以构成的利益需要、价值观念、利益行为与利益所得,存在着一种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它们之间的这种非线性的相互作用,就是本文所致力于探求的利益的生成机制。

关于利益的发展规律,作者试图作出如下粗浅的、有待于进一步修正与完善的表述。

规律之一,是利益的自我发展与社会制约。关于利益的自我发展,似乎是容易把握的。利益的生成机制,也必然是利益的自我发展机制。利益需要、价值观念、利益行为与利益所得之间的加速循环,势必造成利益的不断发展,并为之提供永不枯竭的内在动力。就其现实性上,随着生产的发展,需求的扩大,人们的利益追求与利益所得也必然会不断拓展。这是一种必然存在的趋势。与一般性的利益的自我发展相区别,社会中常常有一些人,其利益行为与利益所得呈现出一种极度膨胀的趋势。这种状况,不可能由人的生理性需要、社会性需要及其正常发展作出充分的解释,而只能由某些人所具有的强烈的占有欲、贪婪,或是把对

利益的无限制追求作为自己生活的目的，等等，才能作出合乎逻辑的说明。另一方面，利益的自我发展与极度膨胀并非是没有限度的，它必然要受到他人利益的或弱或强的制约。这是利益发展的第一个二律背反。当社会中的某些个人、群体、阶层的利益极度膨胀，并危及他人、其他群体、阶层的利益，以致危及其生存需要的满足时，对立与冲突就会不断加剧，制约的力量也就会越来越大。一定时间整个社会的利益所得是一个相对确定的数，一些人利益占有率增大，则意味着另一些人利益占有率缩小，利益占有率变小以至很小的人决不会甘心于长久地承认这种现实，这就必然形成对利益自我发展、极度膨胀的社会制约。

规律之二，是利益的分散化、多元化与集中化、相关性增长。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利益的分散化倾向是特别明显的。每个人都有自身的利益问题，每个人的利益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围绕自身利益展开。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归根到底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存在与发展。商品经济就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较，意味着自己的劳动在多大程度能为社会所承认，并获得相应的利益，意味着他们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与利益的分散化倾向相联系，利益的多元化倾向也特别明显。商品经济所不可缺少的自主性、独立性是利益多元化倾向的内在根据。这是利益发展的一个重要倾向。与此同时，利益的集中化、相关性增长也确凿无疑地存在着，并且相互依赖、相互制约。这是利益发展的又一个二律背反。所谓利益的集中化，是指人们在围绕各不相同的自身利益而展开自己的利益行为的同时，甚为关注国家的政策、法律、权力中心，并力图使自己在不同层次的权力中心占据一定的地位，影响政策以至法律的制定与执行这样一类现象。这种利益的集中化，往往是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政治程序实现的。同样，与利益的集中化相联系，利益的相关性也在不断增长。商品经济的存在，生产的社会化，市场的发展，是利益相关性不断增长的内在根据。有趣的是，当我们在考察利益的分散化、多元化与集中化、相关性增长的时候，也能看到贝塔朗非所揭示的在系统演化过程中出现的渐近机械化与渐近集中化的种种迹象。^②

规律之三，是利益的均衡化与非均衡化。所谓利益的均衡化，是指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以利润率的平均化趋势为基础的经济利益的均衡化、政治权力的均衡化。商业竞争，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阶层围绕政治权力所进行的政治活动，工人为争取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所进行的斗争，从某一方面看都是这种趋势的种种表现。与利益均衡化趋势同时存在的另一种相反的趋势，便是利益的非均衡化发展。这是利益发展的第三个二律背反。资本的原始积累，企业的大型化与垄断，大财团对国家政治生活影响的增强，这类现象都是利益非均衡化的明显表现。造成与加强这种趋势的原因，首先是财富与产权的作用。财富越多，占有的资产越多，越有利于获取更大的利益，这个道理是清楚的。其次，政治权力在利益的非均衡化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依靠握有的政治权力制定有利于社会中的一部分人的政策，使之合法化，甚至越出一定的规范给自己和他人以特殊的好处，这些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此外，社会声望对利益的非均衡化发展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声望可以获得经济利益，也可以获得政治利益。在财富、政治权力与社会声望之间，同样存在着一种相互作用、加速循环的机制。这种加速循环一旦实现，就会造成利益的加速增长，日益加剧利益的非均衡化倾向。

三、利 益 结 构

尽管结构性与主体性、结构主义与人本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然而无

可否认的是,人与人之间利益的相互作用,势必形成一定的利益结构或利益格局。与此同时,本文在论述利益结构及其演化的时候,将充分注意到社会历史领域明显区别于物理世界、化学世界、生命世界的特点,并在可能限度内使二者结合起来。

从一种角度看问题,我们可以把人们的利益区分为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与社会声望^③等三项基本内容,形成一种多层次的利益结构。在这样一种利益结构中,经济利益处于基础的地位。然而当人们的经济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并且积聚了一定的财富时,就会对政治利益提出要求。这种政治利益要求的提出,一般是以群体、阶层利益代表的身份或名义提出的,并体现为在不同的政治机构中掌握一定的权力。这种政治利益的追求在西方往往是通过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实现的。占有较多的财富和较为重要的政治地位,无疑会使自己的社会声望得到增强。反过来,社会声望也有利于增强自身的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对社会声望的追求达到极点,便形成对至高无上的个人崇拜、领袖崇拜的追求。这种现象,尽管可以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膨胀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解释,但还不足以使其得到充分的说明。这种发展到极端的名望追求,与一定的文化价值观念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由此可见,以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社会声望为中心而展开的多种利益行为,由经济利益上升为政治利益以至社会声望的递阶式跃迁过程,三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加速循环,对于社会历史的驱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与历史唯物论所确认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原理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当利益的非均衡化发展直接危及到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时,生产力,首先是人,就会遭到破坏和危害,生产关系,特别是产权、占有关系,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为产权、财富的占有在利益的非均衡化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当利益的非均衡化发展表现为政治权力的极度膨胀,而又反过来维护社会中的某些阶层、集团的特殊利益时,便形成了居于社会主导中心地位的政治上层建筑同生成中的新的生产关系,如产权的某种变化,雇主和工人利益关系的某种变化的矛盾。不同的是,本文对这样一种利益结构所作出的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考察,明显具有实证研究,并使实证研究与机理研究结合起来的特征,采用的范畴也明显地区别于原有的范畴。

除了上述从利益的基本构成与递阶式跃迁的角度表述的利益结构以外,我们还可以从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群体利益、社区利益、民族利益这样一种利益序列中,研究利益的多层次结构。这是一种具有某种包容性特征的、多层次的利益结构。个人利益具有强烈的个体化、个性化特征。家庭利益包容个人利益但不归结为个人利益。群体利益,特别是正式群体利益,对个人利益具有包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利益具有包容性,但也不可能与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相重合。群体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非个性化特征,但与国家利益相比较,则仍然是较为接近个体的一个利益层次。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作为正式群体的企业逐渐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中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就具有了较多的同一性。社区利益不同于群体利益,但前者对后者仍有一定程度的包容性。社区有小有大,小到一个城市,大到一个更大的区域,如我国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作为整个国家中的一部分,三个地区都有许多共同利益,然而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们也都有各不相同的特殊利益。民族利益与区域利益不是一个概念,但由于我国汉民族多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兄弟民族多集中于西部地区,因而区域利益与民族利益存在着相当范围的交叉或重叠。因此在我国处理区域利益关系的时候,不能不慎重考虑民族利益的关系问题。

此外,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程即总生产过程,研究不同群体、阶层的利益关系

与利益结构，也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从这样一个角度看问题，生产领域的人员、流通领域的人员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从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人员之间的利益关系，工人与农民、经营者与工人、贫困户与富裕户、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个体户与国家职工、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也同样形成一定的利益结构。这种利益关系与利益结构更接近于社会的表层，更能从人们的社会心理中得到直接的反映，因而更具有实用价值。

四、利益结构的演化

前已述及，利益发展遵循某些规律。当利益的非均衡化恶性发展，危及人们生存需要的满足时，当人们的利益表达严重受阻时，原有处于稳态的利益结构就会产生涨落，并引起社会震荡以至社会变革。社会变革以社会制度的变革而告终。当然，这丝毫不否认在社会制度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利益结构的演化。限于篇幅，这里仅就我国当前的情况，对造成原有利益结构演化的原因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1. 社会主导中心的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前，阶级斗争占据社会主导中心的地位。这种阶级斗争实质上是自然经济——产品经济排斥商品经济的斗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现代化建设与发展商品经济成了社会的主导中心，这样就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变化。政治利益是重要的，但经济利益得到了社会上众多人的关注，以至造成了许许多多的人热心于从事商业活动和经营活动，不少人不安心于其他工作的局面。

2. 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并非是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而主要是经济运行机制、政治程序的一种改变。即便是如此，也会相当大地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格局。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计划体制、价格体系的改革，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干部制度、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经营体制、产权制度的改革，流通体制的改革，科技、教育体制的改革、等等，都极大地改变了生产者个人、生产单位与国家之间，不同产业之间，生产、流通与消费领域之间，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农户之间，青年人与老年人之间，男性公民与妇女之间，厂长、经理与工人之间，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利益格局。所有这一切改变，最深层的根源是由自然经济——产品经济模式向商品经济模式的转变。我国目前，商品经济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自然经济——产品经济的遗存仍然很多，为现代化所必需的财富与资产的早期积累，必然会在给人们带来希望的同时也带来痛苦。因此，尽管我国进行了十年改革，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格局却带有极大的不稳定性，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也还会是这样。这就必然会在人们的心理和行为上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3. 经济与社会政策。国家政策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广义的政策包括行政的、经济的、文化的、科技的等各个方面。这些政策都直接间接地影响到人与人之间利益格局的改变。例如国家的干部政策、劳动人事制度、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等，都具有改变原有利益格局的重要作用。

4. 竞争与合作。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人与人之间，各种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各部门和各地区之间，存在着合作的一面，也不可能设想没有这种合作。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与社会化是这种合作的经济基础，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存在，国家统一与安全的需要，都是形成这种合作的稳固基础。然而，也正是由于生产的商品化、专业化、社会化，产生了人与人之间、不同利益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从根本上说又是围绕着各不相同自身利益展开的。这种竞争与合作，是形成人与人之间利益格局的内在机制，是社会富有生机与

活力的表现。社会主导中心的变化、体制改革、经济与社会政策等等因素，都要通过人与人之间利益行为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竞争与合作^④，才能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化。利益格局是处于稳态，还是发生涨落，抑或是被拖到一个分叉点，归根到底都取决于利益结构内部与外部的交互作用。

五、利益结构的不断调整与社会进步

深入了解了利益结构的演化机制，有利于对利益结构进行及时的调整。在这里，人不仅成了利益结构的客观载体，而且成了调整利益结构的自觉主体。这种研究，再一次突破了结构主义和系统论的局限，使其更加接近于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与改革的全面展开，利益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十年来逐步形成的利益格局，比之前三十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进步。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地方，有些甚至很不合理，需要不断地进行调整。例如相当突出的脑体倒挂，利益主体与动力主体的严重脱节，流通领域的利益所得大大超出于生产领域的利益所得，国家职工与个体户收入之间的相当大的差距，官倒现象，国家公职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与广大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等等，都极大地挫伤了这一部分人或那一部分人，以至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同时也干扰了建设与改革的顺利发展。

要对现存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必须进一步明确利益结构的目标模式。我国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传统有别于西方，因而受其制约的利益结构也必须有自己的特点。我们既要注重社会公平，又要讲求效率；既要关心人的多方面的发展，又要关心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兼顾两者。在这里，有一个如何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人道主义与效率主义^⑤、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关系的问题。看来，确立一个“公平—效率”的目标模式，对于不断调整现存的利益格局，建构合理的利益格局，并非是没有意义的。围绕这一目标，我想从以下一些方面采取措施调整不合理的利益格局是重要的。

第一，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合理的产业政策既要有利于调整产业结构，以增强综合国力，适应国际竞争、国际经济大战的需要，又要考虑到建构“公平—效率”的利益结构。一般地说，重视基础工业、高科技领域的发展，适当控制高档消费品的消费，是有利于逐步改变脑体倒挂、流通领域的利益所得大大超出于生产部门的利益所得的不合理状况的。

第二，强化财政、税收、信贷、利率等宏观调节手段。要通过上述手段，有力地促进基础工业、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促进教育事业的更快发展，真正使现代化建设的动力主体，也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利益主体。要通过上述手段的调节，使劳动投入多的人、从事复杂劳动的人得到更多一些利益，对非劳动所得，包括风险收入、资产收入、剥削收入等，要分别情况，课以较高的所得税。要通过上述手段防止财富的过分集中与积聚。

第三，实行有效的权力制衡。实行政治过程的民主化、公开化、程序化，加强新闻传播媒介的监督作用，严肃党纪政纪，切实实施审判机构的依法独立审判，疏通群众与政府的信息交换渠道以及利益表达渠道，有利于防止滥用权力，克服公职人员中的腐败现象，避免决策的重大失误，同时也有利于改善党、政府和群众的关系，调整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第四，实行观念变革与“心理革命”。为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格局，建立以“公平—效率”为中心的利益结构，就需要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手段促进人们的观念变革，特别是价值观念的变革。要兼顾经济价值、道德价值与审美价值，兼顾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此外，在自

然经济—产品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心理，习惯于田园风光似的幽闲与恬静，人与人之间的天然尊长、温情默默，以及大同理想式的生活方式。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在心理上往往表现出不安、烦躁、飘忽不定、失落、不满以至骚动，这近乎于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人们建立一种适应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正常心态，即敢于面对现实，有强烈的进取精神与竞争意识，并保持必不可少的冷静与理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确乎接近一场“心理革命”。而建构一个合理的利益格局，价值观念、心理方面的条件是必不可少的。

第五，实施行为控制。这就是利用思想教育、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对破坏合理的利益关系的利益行为，实行有效的控制。其目的在于使人们的利益行为遵循一定的规范展开。除了直接行为控制以外，还有许多措施属于间接行为控制的范畴。在这里，各种控制手段的耦合，抓住主要因素实施控制，掌握一定的控制强度，实施前馈控制，都是十分重要的。

写到这里，本文近乎完成了从论述利益行为及其对社会历史的推动作用开始，到对利益行为实施控制而结束的“自循环”，一个包含有“自催化”功能在内的“自循环”^⑥。这种论述不仅从一个截面解剖了社会历史的动力学机制，揭示了社会历史的“自然历史过程”，而且接纳了人、人的情感、意志与观念，确认了人在人类社会的“自然史”中的主体性地位，以及人对人自身行为的控制。这对于消除以往历史观中的非主体化倾向，消除以一般社会关系淹没个体的倾向，无疑是有帮助的。

注释：

① 参看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

④ 参看哈肯：《协同学》。

② 参看贝塔朗非：《一般系统论》。

⑤ 参看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

③ 参看伦斯基：《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理论》。

⑥ 参看爱根：《物质的自组织和生物高分子的进化》。

(上接103页)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聊斋志异》所标志的高峰，也是文言小说自身发展机制的光辉终结。从此以后，再没有人能够站在蒲松龄的肩膊上更上一层楼，或者在文言小说的天地里开拓出更新的领域。比蒲松龄后出的纪昀，虽然对《聊斋志异》颇有微词，并创作了尚质派的代表作《阅微草堂笔记》，试图与之相抗衡。但因其创作目的上强调“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在艺术表现上强调纪实而反对想象、虚构和夸张渲染，在对待传统的态度上又主张复古，囿于汉魏六朝小说，尚质黜华。这样就必然降低小说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意义，背离小说的发展方向，因而终于显得支绌而无法抗衡下去。此后，也出现了追随和模仿《聊斋志异》的藻绘派小说，如沈起凤的《谐铎》、长白浩歌子的《萤窗异草》以及宣鼎的《夜雨秋灯录》等等，其中虽有不少可读之作，但笔力之强弱，情韵之沉浮，幽愤之深广，毕竟已是强弩之末，难乎超《聊斋志异》而上了。于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整个文言小说的帷幕也就缓缓降下，并将说部的舞台全让给白话小说来争芳斗艳了。

注释：

① 程千帆《唐人进士行卷与文学》

④ 《艺术哲学》第一章

② 杜佑《通典》卷十七

⑤⑥ 《中国小说史略》

③ 汪辟疆《唐人小说》

⑦⑧⑨ 《聊斋自志》